

青远胜于蓝

顾明远

王英杰主编的《顾明远教育思想研究》2018年10月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当时没有在意，以为是我的学生和学生辈为纪念我从教70周年写的应景文章。今年此书的英文版出版了，我不免找到原本来看一看。发现此书都是现代教育界的名流，引用我的话大做文章，对教育中的重大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是一部有理论深度的学术著作。

我一直认为，本人虽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工作者，并且工作了70余年，但是在理论上没有多大建树，我只是就教育领域内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常常把自己譬喻成丛林中的小草、繁花丛里的野花、花枝上的绿叶、培花用的泥土，哪里有什么教育思想体系？

《顾明远教育思想研究》的作者竟然从我的泥土中挖掘出思想理论，并对教育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例如石中英教授对教育的本质和价值观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论述；褚宏启教授论述了教育现代化的历史

进程和基本特征；郭华教授结合新课改对基础教育的课程和教学进行全面的论述；刘宝存教授对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作了历史回顾，讨论了各国不同的大学理想和价值观以及世界高等教育的改革；朱旭东教授详细论述了教师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其他如张东娇、高益民、滕珺教授等也都对某一个教育领域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他们对教育中理论问题的探讨和论述，远远超过他们所谓的“顾明远教育思想”。我的一些零零碎碎的言论，不过是一个引子，引起了这些专家的深入探讨。我一方面感谢他们对我的爱护，另一方面欣喜他们对教育理论的深入研究。如果说我们这一代学人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则下一代学者正在超越我们，他们在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上正在作出新的贡献。《顾明远教育思想研究》一书不是顾明远的教育思想，是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著作，本书的意义和价值正在于此。在英文版出版之际，特此说明我对本书的认识和对作者的感谢。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视觉中国 供图

从斯宾塞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到阿普尔追问“谁的知识最重要”，这两次世纪之问，标志着课程研究的关注焦点由知识的现代化诉求，逐步转向对知识价值背后权力结构的深层揭示，透析了效率与公平的不同视角，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顾明远先生的兴趣学习论

21世纪的前四分之一预示,新的百年必将会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信息、知识数量上的几何级数变化,而且导致数据、信息、知识生产方式的全方位迭代式革命。学校学习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多模态、富媒体、易得性的课程资源扑面而来,新技术的发展完全实现了“时时可学、处处能学”的泛在学习;另一方面,机器与人之间的主体张力丰实且又消解着学习者深度思考的能动性,切片化的多元信息和信息茧房的数据算法,冲击着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和持续的学习意愿。

在学习顾先生这半个多世纪中所发表的作品时,笔者感觉到其中隐含着课程领域的第三次世纪之问,那就是“想不想学是首要”,用顾先生的话来说,那就是“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

纵观顾先生的教育著述,他对兴趣的关注一以贯之,早在40多年前,顾先生就提出“学校教育中要在课堂教学为主的前提下,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从小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北京成人教育通讯》1981年第1期);在《让儿童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中国教育月刊》1990年第4期);后来,他在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讲习班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明远“两句”,即“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人民教育》1997年第4期);2000年,他首次以“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为名所写的论文发表在当年第1期《教师之友》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兴趣学习理论。

此后,他的兴趣学习理论不断发展与丰富,内容涉及兴趣的来源与本质,涉及兴趣与学习动机、愉快学习、理想培养、因材施教、选修课程建设等关系的探讨,提出了很多富有见地的观点,如“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才能是和花朵一样,需要精心培育和浇灌的”“历史上众多科学家的发明都源于自己内心强烈的兴趣。兴趣是学习的动力,成功的基础”,等等。此外,他还提出了从幼儿园到中学培养学生兴趣的建设性方案;回答了信息化时代如何处理好兴趣与学习的关系问题,提出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设计学习的进程、学习的方案,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差异和兴趣爱好,为他们定制个人发展的方案、学习的方案。(《现代教育报》2016年12月16日第5版)

这些论述体现了顾先生对兴趣学习的深

刻洞察,在他看来,兴趣既是学习的起点、动力与权利,也是通向全面发展与个性成长的通道,“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不仅是一句教育箴言,更是推进当代课程改革的关键支点,是21世纪需要关注的重要课程问题。

“兴趣学习”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

历史地看,自从有了人类教育,人们就会关注学习兴趣问题,且对兴趣的关注是伴随着教育实践与理论的发展而发展的。从理论上,兴趣学习的背后是儿童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早在19世纪初,德国教育家赫巴特(J.F.Herbart)就强调培养儿童“多方面兴趣”的重要性,建构了世界教育史上第一个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学校课程体系,使得课程设计超越了经验主义。然而,其对兴趣的解释是先验的、抽象的,知识是百科全书式的,教学内容选择和方法设计充满了预设性,同时,他强化了教师在知识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学生主体的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遭受了忽视。因此,尽管赫巴特在形式上强调兴趣,但实质上并未真正解决儿童如何在具体教育情境中自主生成兴趣的问题。

到了20世纪初,杜威(J.Dewey)基于对儿童原始冲动的认识,将兴趣定义为连接个体生命与环境互动的核心纽带,兼具三重属性——实践性、生长性与社会性,并将兴趣划分为语言交际、制作、探究、艺术四类,进一步推动兴趣理论的建构,开创了“儿童中心课程”研究范式。然而,他过度依赖“本能论”解释兴趣起源,以自然生成的心理机制解释兴趣的生成,忽视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价值,也低估了外部环境制约作用,随后的课程理论一直没有解决好兴趣与学习、儿童与知识的关系问题。

顾先生“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的论述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逻辑起点,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与时代感。他立足中国教育的现实土壤,坚持学生主体、以人为本的立场,用辩证的思维,建构了兴趣与学习的新图景:既要尊重兴趣的原始动力,又要建构制度化的课程通道;既不自盲目放任,也不强行灌输,在“学生想学”与“课程该教”之间,寻求一种符合教育本意的深度联结与主体能动,在保持教育专业性的同时激活学习主体的生命自觉。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顾先生就批评过学生“被教育”“被学习”的教育模式,遗憾的是,40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从某个角度来看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教育强国建设的愿景恰逢数智时代,学习不再是如何获取知识的问题,而是要解决“为何而学”“如何想学、愿学、乐学”的挑战。这是新世紀的课程之问,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重温顾先生“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的论述,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读思录

叶静

年近四十,遥望来时路,回首语文事,多多少少懂了些;语文人的成长并成熟都是浸染在时光里的,和语文紧紧联系的阅读、思考、设计以及课堂实践,都是需要和岁月一起沉淀、发酵后才升腾绚丽的。而阅读,是垫起我教学高度和深度的基石。

2009年大学毕业,刚上讲台的那几年,我教得很刻苦,早出晚归,时间和精力全都倾注在教学和管理上,但很少读书。我以为,勤抄教参,多考试,多批改,多校对,语文如此重复,却从未想过要把阅读变成生活方式,要找回生命灵魂的呼吸。

阅读的回归,缘于我的一堂语文公开课。2013年的秋天,在安徽省亳州市举行的语文教学观摩会上,我执教汪曾祺先生的散文《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根据教参解释,文章写了汪曾祺先生对北京“胡同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我就此理解上了一堂颇为满意的课,那一句“虾米熬白菜,嘿”的朗读更是激起了阵阵掌声。

可没多久,我无意中读到了史绍典先生对《胡同文化》一文的解读:“他没有对胡同文化进行批判,完全没有批判的意思。对胡同文化,他有一种依恋、一种感伤、一种怀念,还有一种无可奈何。”原来,《胡同文化》是汪曾祺为《北京胡同》这本摄影集写的“序言”,这本摄影集就叫《北京胡同》。《北京胡同》本身,有一种强烈的保护北京特有胡同的情绪。“它是在批判、批判胡同文化吗?”这几行字,杂志上印得不大,却是那么显赫地晃动在我眼里,晃着晃着就化成了这样一声棒喝:“你有读书吗?”我羞愧至极,为自己的无知和浅薄,更为那无数个不阅读的日子。

教学的孱弱其实就是阅读的苍白。钱梦龙老师说:“语文教学其实也是语文教师自身读写状态的生动展示。”“有些语文教师平时除了几本‘教参’几乎什么书都不读,什么文章也不写,一心想在教学方法上花样翻新,以为这样就能提高教学水平,这种舍本逐末的追求,结果必然是缘木求鱼。”书香澄余泽,杳然天界高。语文教师失去了阅读的基石,黯淡了思考的灵魂,把自己一味封闭在狭小的教参空间,必然会流失生命的气息,他的课堂也必然走失灵魂。

书架开始生长。余华的《活着》挤走了教案集,福贵牵着老牛经过讲台时,总有学生偷偷抹眼睛;木心的《文学回忆

书房故事

珍藏一本,珍爱一个系列

师延峰

当年装修房屋时,为了做更多的书柜,特意让设计师考虑开放式书房。于是,就有了从书房到客厅,整整两面墙壁的嵌入式书柜。但是,纵然再大的书柜,也扛不住日积月累的淘书,以至于还是有很多心爱的书无法如需归置,最后只能层层叠叠地堆码。总担心小孩从低层的书柜里取放书本时发生“高空坠物”的危险,我就只能过一个阶段整理一次,一方面消除安全隐患,一方面也为购置下一批书腾出空间。

爱人的观点是,如果是三五年来的都不曾想起看过的书,就可以处理掉了。这话自然是有些道理的,然而阅读一本书的契机,并非简单的道理能解释得清的。比如我最近一次读《百年孤独》,就完全不在本来的阅读计划中。

温州市教研院在每学年初进行整本书阅读的征文评选,可以是读后感,也可以是读书小论文。我任教班级的学生里,今年竟有两位同学选择写《百年孤独》。为了指导他们修改征文,我就得重读《百年孤独》了。

我这本泛黄的《百年孤独》,是读大学时从一家旧书摊上淘来的,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的版本,我一直将其视作书房的“镇馆之宝”。之所以这么说,倒不是因为我爱买时花了多少钱,而是它差不多算得上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传播的见证。

据《〈百年孤独〉引进三十年,再没一本外国小说引起如此轰动》一文介绍:“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世界文学》杂志抓住机会,在1982年第6期上节译了《百年孤独》的第六章,译者沈国正、黄锦炎和陈泉。”我书柜里这本《百年孤独》的译者正是黄锦炎、沈国正、陈泉等人,他们当年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风华正茂的教授。想必在《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百年孤独》的第六章后,教师们又译了其他章节,几年后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其中的一本,不知经过怎样的兜兜转转,才

录》躺在办公桌抽屉里,上课铃响前翻两页,粉笔字便染上春秋战国的烟雨。最惊喜的是《论语》,从前只当它是考点大全,如今却在“暮春者,春服既成”的句子里,看见两千多年前带着学生踏青的孔老师,他的布鞋上沾着和我们春游时一样的草籽。

去年教高一时,讲解《赤壁赋》时,我把苏轼的孤舟泊进了小王子的B612星球。学生们惊觉,“寄蜉蝣于天地”的苍茫与“驯养玫瑰”的执着,原是生命长河的两岸青山。当有学生用《寻梦环游记》的万寿菊桥,连接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时,教室里空的积雨云突然裂开一道光的缝隙。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他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安静下来的我,开始利用教学外那些边角角的时光去读书。读鲁迅,读余华,读蒋勋,读木心,读博尔赫斯,读《论语》,读《庄子》,读唐诗宋词,读哲学的、文学的、美学的……

钱梦龙先生的感言恰似醍醐灌顶:“语文教师自身读写状态就是最生动的教参。”那些年困守教参的苍白岁月,恰印证了朱永新的论断:“没有教师的精神成长,何来课堂的生命气象?”当我在教育典籍中寻找救赎,苏霍姆林斯基的忠告与于漪的教诲形成和弦——教师书架的高度决定课堂的海拔。叶圣陶的“教是为了不教”在书页间苏醒,王栋生笔下的教育良知像一盏灯,照亮了我教案上蜷缩的旧灵魂。

阅读上去了,思想深邃了,眼光独到了,教学也就灵动了。教《孔乙己》,我从“记”字切入直逼看客冷漠的个性,且使看客的冷漠有了历史的纵深;《临安春雨初霁》着眼“小楼一夜听春雨”一句,就和学生们一起真切地听到了放翁那遥远的关于国之爱的叹息;《琵琶行》里“江州司马青衫湿”“唯见江心秋月白”,仅点此两句,乐天的浩渺情绪即刻漫溢至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人的心境得以改良,你的课堂也因而润泽。批改作文时,我常在红笔停顿的间隙望向窗外。红枫树的新芽又爬上三楼的窗沿,让我想起初上讲台时总爱引用的句子:“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如今才懂得,最先要摇动的,是自己这棵曾险些枯槁的树。那些在书页间重获生根的日子,那些被学生的泪与笑浇灌的深夜,终于让年轮里长出了更柔软的春天。

（作者系山东省临沂市临沂商城实验学校语文教师）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这是顾明远先生在长期的思考与研究中提炼出的教育信条,也是我们常说的“明远四句”。这四句话简洁精练,却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智慧和深远的时代意义。这里,笔者尝试围绕《顾明远教育思想研究》一书,结合课程领域引发关键思想转折的两次世纪之问,解读顾先生的“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探讨这一信条如何塑造和呼唤新时代的课程之问。

课程领域的两次世纪之问

几百年来,每一个时代的课程思想都曾被一个核心问题所撬动。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进入高峰期,蒸汽机应用持续普及,传统手工业加速向机械化生产转型,这一变革导致社会对技术人才需求剧增。而当时教育体系仍以古典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和神学为核心,教学内容与工业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严重脱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英国教育家斯宾塞(H.Spencer)于1859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提出了19世纪的课程之问,并系统提出“科学知识最有价值”。这一论断构建起科学主义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石,主导了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教育逻辑,深刻地影响了后续课程编制与知识选择。

到了20世纪中后期,课程研究领域出现了范式转换和概念重建,从技术理性到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多元解构,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思考成为课程理解的视角之一。在这一视角观照下,建构于斯宾塞论断之上的技术化课程观存在明显的缺陷——过度强调知识的客观性与效用最大化,视知识选择为中立的的技术问题,忽视知识背后隐含的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结构性权力关系。美国批判教育学家阿普尔(M.W.Apple)认识到,课程知识本质上是特定群体文化资本的制度化表达,课程不只是知识的选择,更是“谁的知识”被合法化的问题,因此,阿普尔提出另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谁的知识最重要?阿普尔的问题将课程置于“知识—权力—控制”的三维框架中,为理解当代教育公平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透镜。

深度解读

21世纪课程之问：想不想学

——解读顾明远先生的『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

崔允沁